

凯恩斯著作集

John Maynard Keynes



劝说集

ESSAYS IN PERSUASION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著

李井奎 / 译

凯恩斯著作集

John Maynard Keynes



劝说集

ESSAYS IN PERSUASION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著
李井奎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劝说集/ (英) 凯恩斯著; 李井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
(凯恩斯著作集)

ISBN 978-7-300-22215-8

I. ①劝… II. ①凯…②李… III. ①凯恩斯主义 IV. ①F0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1626 号

凯恩斯著作集

劝说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李井奎 译

Quanshuo 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4.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51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向著名翻译家蔡受百先生致敬！

——译者

绪 言

本书汇集了一个无人肯听的预言家十二年来从未止息的拳拳之语。十二年来，他的话从来未能影响到事态的进展。也许，将这本书命名为“预言与劝说”倒更为恰当一些。不幸的是，预言往往而中，而劝说却常常只是徒劳。但是，本书中大部分文字都是在这种意在劝说的精神下写就的，目的就是想能够影响舆论。在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发表之时，常有人认为它们措辞偏激，出言粗率。但我却认为，今天的读者若能试读一二，掩卷思之，必能认识到之所以有人会对本书中的文字有那样的印象，多半是因为它们与当时时代的情感和舆论往往相左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它们自身真的是偏激、粗率之文。恰恰相反，虽然我作为一个当事者，未免会心怀偏颇，但是重温这些文字之后，我感到，其言过之者寡，而犹尚不足者多。所以如此，也是当时的写作环境使然。因为我在写作这些篇章的时候，即已痛苦地意识到，必有大群当事之人对我起而攻之，附和者必然寥寥，所以我必须煞费苦心地对那些不能佐证之事尽量避而不谈。而今思之，彼时我常怀惕厉，语气温委，必不使所言出于我所确信及证据所及之范围，尚历历如昨。

本书中所汇集的这些文章，很自然地分为五个部分，适才所述，仅适用于前面三个部分而不包括后两个部分；前面这三个部分，所关涉的正是过去十年大论战的三项论题——和平条约与战争赔款、通货紧缩政策和金本位的恢复^①。对于这三项论题，我都曾戮力以赴，投身其中进行辩论。事实上，这三项论题在多个方面都有联系，而后面两个的联系则尤为紧密。在这些文章的写作上，作者往往都是匆忙草就，不顾一切地迫切希望能够及时说服一众读者。但是在本书后面两个部分里，时间的车马则较少带来干扰的喧嚣。于此，作者意在洞彻更为遥远

^① 在我们恢复金本位之前的1923年，我就写过一篇题为《关于未来货币调节的一些有益的建议》的文章，本书把它作为第三部分的第三篇予以转录，时至今日，我仍然坚信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那些主张。虽然现在我们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但是这些建议仍未失效。而对那些想了解本书作者会如何处理当前货币问题的读者，也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窥其大略。

的将来，对于那些需要缓慢的演化过程才能予以明辨的事务，能够虑之再三方始落笔。相对而言，在这些问题的思考上，作者也更为从容和冷静。这两个部分的文字，较清楚地显露出了本书作者实际上始终关注着的核心主题：深信匮乏与贫穷的问题以及阶级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我们可以简略地称之为经济问题，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感到憎恶的混乱状态，一种转眼即去且毫无必要的混乱状态而已。西方世界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条件，若能创生出一个体制来将这些资源和技术条件加以利用，就可以减轻这个现在已经牵扯了我们很多精神和物质能量的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使之降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去。

这样来看，作者的这些文字，言之拳拳，仍是希望并坚信，经济问题退居其次，回到它本来应在的位置上去，时日已然不会太久，我们心灵和头脑的舞台将会重新被那些真正的问题所占据。人生的问题，人类关系的问题，艺术创造、品行修养和宗教虔敬的问题，这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问题。而且从经济分析中，恰恰可以得到信仰何以会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微妙原因。如果我们在一种乐观的假想状态下不懈努力，那么，这种假想状态反倒极可能被我们变为现实；而如果总是沉湎于一种悲观的假想状态下行事，那么，我们只会让自身永远深陷困乏之境而难以自拔。

本书选入的这些篇章综采作者曾经发表过的那些著作、小册子或报纸与杂志的文章，汇为一卷，而未详加分类。处理的方法往往是，对于那些看起来对所表达的主旨有些多余或没有必要，以及时人对于事件的经过已无兴趣的段落，就信手删去了（并未在文中予以明言）；而对于留存下了的部分，则未做改动。本书新加入的那些解释性注脚，则被放在了脚注中。作者努力确保本书所做的删节不管在哪一个方面都没有改变原文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对于那些喜好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研究者——如果确有这类人士存在的话——在本书最后给出的文献来源列表中，我还是注明了每篇文章的出处，在这些地方可以找到当初发表时的原文。^[1]

我挑选这样的日子来出版此书，可谓正当其时，因为我们当下正站在事态转变的关节点上。人们把它称之为了一场国家危机。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对于英国来说这场危机已经过去。整个国家暂时处于一种间歇的平静时期。此时正是1931年秋天，前后顾盼，我们只不过是在两大悬崖飞瀑之间平静的水潭边，略作小憩而已。最为主要的是，我们已经重新获得了选择的自由权。时至今日，在英国已经很少有人还会相信《凡尔赛和约》，或者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抑或通货紧缩政策。在这些战斗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主要是依靠事态发展难以抗拒的压力，其次只能是陈腐的陋见逐渐散去所致。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于

[1] 在本书中，我是以每篇篇首译者脚注的形式给出的，没有再于书后给出原文发表的出处。——译者注



下一步该如何走，我们打算如何利用这重新获得的自由选择权，仍然只是具有一种模糊的认识罢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通过提醒读者我们所走过的那些过去的、当时的事态何以至此，以及我们所犯下的错误之性质，我乐于奉上我所提出的解决办法。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31年11月8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和平条约

1 巴黎 (1919)	3
2 德国的赔偿能力 (1919)	6
3 关于欧洲重建的建议 (1919)	12
4 舆论的转变 (1921)	25
5 战争债务和美国	29

第二部分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1 通货膨胀 (1919)	43
2 币值变动的社会后果 (1923)	45
3 法国法郎	58
4 劳合·乔治能够做到吗?	65
5 1930 年的大萧条 (1930)	74
6 关于节俭 (1931)	81
7 币值崩溃对银行的影响 (1931 年 8 月)	93

第三部分 回归金本位

1 对黄金的贪婪 (1930 年 9 月)	101
2 货币政策的若干不同目标 (1923)	105
3 关于未来如何调节货币的正面建议	120
4 银行行长们的发言 (1924—1927)	124
5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 (1925)	137
6 通过关税政策来缓和当前的事态	152



7 金本位制度的终结（1931 年 9 月 27 日）	162
-----------------------------------	-----

第四部分 政治

1 苏联掠影	169
2 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179
3 我是一名自由党人吗？	185
4 自由主义与工党	194

第五部分 未来的展望

1 克里索尔德	201
2 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	207

译者跋	219
-----------	-----

第一部分 和平条约

1 巴黎 (1919)^[1]

随遇而安、顺应环境的能力，可谓是人类的一大显著特征。我们当中几乎没有谁真正明确地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西欧赖以生存的经济体制所具有的那种极不寻常、变动不居、复杂而又难以依靠的临时特性。我们常把自己最近所获得的一些极为特殊、转瞬即逝的有利条件视为当然，自以为它们会是长久而可靠的，并以此来谋划着将来。在这种脆弱性和临时性兼具的基础之上，我们设计社会改良之道，整饬政治纲领，延续着我们的仇恨和某些特别的野心，自以为是地以为我们有足够的资本来对欧洲大家庭内部的冲突推波助澜，而非息事宁人。德国人民受荒唐透顶的妄念和不顾后果的利己之心驱使，倾覆了我们所建立的赖以生活的基础。而英法两国人民的代言者们又以《凡尔赛和约》而冒彻底倾覆之危，步德国人的后尘。如果这个和约一旦实施，则本当予以修复之际，却又必将使得这个已经受到战争摧残的、脆弱的、复杂的体制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到了无可收拾之境地。而正是通过这一体制，欧洲各族人民才实现了丰赡自足和安居乐业。

在英国，生活的表象丝毫没有让我们感受或认识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忙着将过去所丢失掉的生活重新弥补起来，唯一不同的是，比起以前，我们很多人看上去要富裕得多。在战前我们花费几百万的地方，如今花费数亿也毫不为意。很显然，我们尚未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生活的全部潜力。有鉴于此，我们不仅希望重新安享 1914 年时的那种舒适的生活状态，甚至还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加舒适，更加富足。所有阶层的人们都这样来擘画着将来的生活，有钱人花费更巨，储蓄更少，而穷人们则是花得更多，干得更少。

不过，可能也就是英国（和美国），对于此种情况才这般无知无识。在欧洲大陆，早已是地覆天翻，怨声载道，此种情形，已是人尽皆知。这已经不再仅仅

[1] 本篇摘自《〈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第 1 章，“引言”。——译者注

是奢侈靡费之风或“劳工纠纷”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关乎生死，挣扎于饥饿和生存，事关一个没落的文明令人可怖的混乱这样的重大问题了。

如果一个人在停战后的六个月里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度过，那么他若偶然造访伦敦，会有恍如隔世之感。英国依然置身欧洲之外。欧洲那无声的震颤，对它毫无触动。似乎欧洲远在天边，英国不是欧洲这血肉之躯的一部分。但是，欧洲毕竟与它是一体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苏俄、罗马尼亚和波兰，同气连枝，它们的结构和文明根本就是一体的。它们荣枯与共，既曾共历繁荣，在战争中这些国家的元气也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伤害，可能会一起衰败下去。尽管我们国家对这场战争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美国与我们相类，尽管我们比美国还要少一些），但是在经济上我们却有置身事外之感。《巴黎和约》所具有的破坏性意义正在于此。如果欧洲内战以法国和意大利滥用其战胜国的一时之权力，摧毁目前已经一蹶不振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而告终的话，那么它们自己也会引火烧身，这是因为，它们与战败国在潜在的精神和经济方面均有着极深的渊源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一个参加了巴黎和会，并在数月会期当中作为协约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一员的英国人，就他个人的忧思和展望而言，他必然会转而站在一个欧洲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些问题。而这对他这个英国人来说可谓是一场从未有过的体验。在欧洲的神经中枢当中工作，他对英国的关注必将大幅减少，心头萦绕的一定是其他更加令人感到恐惧的凶兆。巴黎如同一场噩梦，每个人都被梦魇缠住了。这里弥漫着的是一种虚浮的场面之下大难将至的氛围；人们对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大事件束手无策，感到自身实在渺小以极；各类决策，意义混杂而且不切实际；轻率、盲目、傲慢、迷惘的呐喊，这些古代悲剧中的诸般元素，靡不毕集。安坐在法国宫廷富丽堂皇的大厅之上，我们可能会怀疑威尔逊^[1]和克里蒙梭^[2]自若的神情和如一的外表下，那非凡的仪表，是真实的面孔还是某些奇怪的戏剧或木偶戏中悲喜交集的面具？

与此同时，和会的各项进程都透着这种既非同一般的重要又全然无所谓的气氛。每一项决定似乎都关乎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然而，又仿佛有一种声音无处不在：这些条约中的文字均非割切之语——徒劳、没有意义、毫无效果，而又迂

[1] 即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1912年总统大选中，由于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的竞争分散了共和党选票，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总统。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以微弱优势战胜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获得了连任。——译者注

[2] 又被译为乔治·克利蒙梭（法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少数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法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作出重要贡献，被当时欧洲人称为“胜利之父”。——译者注



远而阔于事情；事态的进程朝向它们冥冥中注定的结局发展，政治家们的运筹帷幄显然对之毫无影响，这给我们一种极为强烈的印象，就好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 以及哈代的《列王》^[2] 中所描述的那样：

岁月之神

看吧，那愚昧的芸芸众生，
他们丧失了一切远见和自制，
被本性的轻率鲁莽驱入了魔窟之门。
剩下来没有别的，
在强有力者只是复仇心炽，
在软弱无能者只是空怀一腔怒火如焚。

慈悲之神

为什么人类的意志，
会导成这样昏聩的行动和心情？

岁月之神

我跟你说过这是在不知不觉中演进的，
就像被鬼迷了的一样，
是和非他们已经不能辨明。

[1] 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战争与和平》于1865年到1869年期间出版，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讲述的是欧洲拿破仑时期的俄罗斯所发生的事。——译者注

[2] 即英国诗人、小说家托马斯·哈代，《列王》是哈代于1903年到1908年创作的关于拿破仑战争的三卷诗剧，是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史诗剧，主要用无韵诗写成。这里的三段诗歌即是凯恩斯从《列王》这部史诗剧中摘录下来的，中译参考了蔡受百先生的译诗。——译者注

2 德国的赔偿能力 (1919)^[1]

经过这场战争，德国几乎失去了它的全部殖民地、海外联系、商业船只和国外的产业，割让了十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三分之一的煤矿、四分之三的铁矿也不复为其所有；大战还造成了两百万青壮年死伤；人民饱受四年的饥馑之苦，背负着巨大的战争债务；通货贬值，购买力尚不及战前的七分之一；它的盟国及其领土均处于分崩离析之境；国内革命风起云涌，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又颇有兵临城下之势；四年鏖战，最终归于失败，无论在国力还是信心方面，都带给了它难以估量的打击。在如此情况之下，德国每年支付对外赔款的能力，势必大打折扣，不可能不受影响。

这些人尽皆知的事实，是如此地显明。然而对德国要求巨额赔款时所做的种种估测，大多却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德国未来所将进行的贸易，将远大于它昔日的规模。

为了达到条约所要求赔付的数额，其支付是以现金形式（或者干脆就是指外汇）还是部分地以实物形式（煤炭、燃料、木材等）来完成，并无关宏旨。无论如何，只有通过具体商品的出口，德国才能履行赔偿义务，而将这些出口商品的所得转到赔款账户之内的方法，比较而言不过是细枝末节罢了。

除非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回归问题的本源，只要有可能就充分利用所在的统计资料，否则对于德国所能赔付的总额度，我们只会陷于完全凭空臆测的境地。可以肯定，德国每年支付的赔款只能是来自它若干年内减少进口、增加出口而扩大的贸易顺差，也只有这样，方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对外支付。德国终究要以商品来进行赔付，而且也只能是通过商品来赔付，无论这些商品是直接供应给协约国，还是卖给中立国，然后再将由此得到的中立国的债权移交给协约国，都是如此。因此，要估计这一过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最为坚实可靠的依据，莫

[1] 本篇摘自《〈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章，“赔款”。——译者注



过于对德国战前的贸易收益进行分析。只有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再辅之以这个国家总的财富生产能力的某些综合数据材料，才能对德国出口超过进口可能实现的最大限度，予以合理地推测。

1913年，德国的进口总计为5.38亿英镑，扣除运输在途的商品和金银这些贵金属的价值之后，出口为5.05亿英镑。也就是说，进口要超过出口大约3300万英镑。但是若要从1913年往前倒推五年，入超额的平均值还要比这个大得多，总计有7400万英镑。由是观之，不但德国战前用于新增对外投资，而且还有其他一些用途征用的资金，均来自它当时所拥有的国外证券的利息以及它在航运、外国银行业务等方面的利润。一旦它的商业船只、国外产业不复为其所有，而且它在国外的银行业务和其他诸般来自国外的收益来源均遭断绝，则原本德国有余力可以进行对外赔付的，如今却也到了无法自给的地步。因此，对于德国来说，当务之急必然是对消费和生产重新加以调整，以弥补现在的这种亏空。对于进口商品的使用，进一步厉行节约，对出口重加刺激，方可得到用于赔款的资金来源。

我们来略微浏览一下德国的主要出口项目：（1）钢铁产品。由于德国损失了大量矿产资源，所以在这方面提高净出口已不大可能，倒是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很大。（2）机器。这方面有一些增加是有可能的。（3）煤炭和焦炭。德国战前在这方面的净出口总额为2200万英镑；协约国暂时认同2000万吨为其当前的最大出口量，认为在将来某个时期可以达致4000万吨的规模，这能否实现尚且是个未知之数；即便以2000万吨为基础，根据战前价格来计，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得到净出口额的增加；同时，如果照这个数量加以盘剥的话，则用煤炭来进行生产的那些制成品的出口额必将大幅下降。（4）毛纺织品。如果羊毛原料这项出口无可增加，而就羊毛原料的供应而言，尚存其他方面供应的要求，因此不但出口难有增加之望，甚至还有减少的可能。（5）棉纺织品。和毛纺织品的情况相类。（6）粮食作物。以前从未有过出口，日后也绝无出口之可能。（7）皮革制品。和毛纺织品的情况相类。

现在，对于战前德国的各项出口，我们已经列出了近乎半数，再无其他项目的商品出口额能够占到总出口额的3%及以上的了。德国还有什么其他商品可以用来进行赔付的呢？染料吗？——这项商品在1913年的总值也只有1000万英镑。玩具吗？碳酸钾吗？——而这两项商品出口额加在一起也才300万英镑。即便对那些用于赔付的商品可以逐项详予说明，它们又能在什么样的市场上出售呢？——要谨记的是，在我们心目中，商品的年出口总值并非是以千万而计，乃是以亿而计的。

至于进口，倒还有一些可说之处。生活标准的降低，对进口商品的消费倒可



能会有明显的缩减。但是，由上可知，很多大宗商品项目的进口下降，势必也会影响出口量。

让我们来做一尚不至称为愚蠢的最为乐观的估测吧！假设德国虽然遭受了重重打击，在资源、设备、市场和生产力均有缩减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最终仍然可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以战前价格计算，每年可提高贸易顺差达1亿英镑。要实现这样的调整，首先必须得结束这种入超的状态，要知道，这一入超额在战前平均可达7400万英镑；而我们姑且假设，虑及此点之后，德国每年还会有5000万英镑的贸易盈余留存。假使战后的价格水平较之战前提高一倍，那么这笔贸易盈余额每年将达到1亿英镑之多。从政治、社会、人事以及纯粹的经济方面加以考虑，我怀疑德国在30年时间之内是否有能力每年偿还这样的数额；但是要做出这样的推断并希望它能够有能力进行偿还，当然尚不至于被视为愚昧无知。

假设利息率为5%，资本回报率为1%，那么这一数字代表了资本总额的现值——约为17亿英镑。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最终的结论，德国能够赔付的较为稳妥的极限数值当在20亿英镑，这包括了一切支付手段——直接可转移的财富、所割让的资产以及每年的赔偿。而究其实际的情况，我不认为它能够达到这样的极限程度。

就我目力所及，只有一个方面尚有增进前述论证所得数字的可能性；也即，如果德国的工人可以被遣至那些受到战争摧残的地区，从事重建的工作，则增进这一赔偿能力尚有余地。据闻，这类有限度的计划，已在考虑当中。像这样可以获得的新增贡献，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取决于德国政府所能努力派遣出来的工人人数，除此之外还取决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比利时和法国的居民所愿容纳的人数。不管怎样，即便在若干年之内要想通过引入工人来从事实际的重建工作，以图取得超过（比如说）2.5亿英镑的净现值，似乎也极为困难；就是这样，我们也无法证明在实践中这会在以其他方式取得年赔偿额之外多得的净增额。

由此可知，如果把德国的赔付能力估计为80亿英镑，甚或50亿英镑，似都不在合理的可能范围之内。那些认为德国在战争赔款方面每年的赔付额可以高达数亿英镑的人士，对于他们认为这种赔付当以何种具体的商品来给出，这些具体的商品又当在哪些市场上予以出售，应该做出明确的说明。除非他们能够详加说明，为他们的结论提供某种坚实的论证，否则均不值得被我们所接受。

我要再提出三条附加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并不会影响到我前面对直接的实际目标所做的论证之效力。

第一，如果协约国在5~10年间能着力“培育”德国的贸易和工业，给它提